

宋蒙釣魚城戰役中熊耳夫人家世及 王立與合州獲得保全考(註一)

姚 從 吾

一、引 言

十三世紀若就武力一方面而論，可以說是蒙古族稱霸亞洲與威脅歐洲的時代。一二〇六年成吉思汗統一了整個蒙古，建號大汗。一二一一年到一二四年敗走金朝，佔領中都(北平)。一二一九年到一二二五年，他又親率大軍西征花刺子模。(蒙古第一次西征。)跟着一二二六年又滅了西夏，一二二七年病死。一二三一年到一二三四年窩闊台汗大舉滅了南遷開封的金國；一二三六年到一二四一年他又命拔都、速不台征服俄羅斯，波蘭與匈牙利。前鋒軍(主將爲海都，拜答兒)曾大敗波蘭大公亨利第二(Herzog Heinrich II.)於瓦耳施他提(Wahlstatt，猶言戰場)。(蒙古第二次西征。)一二五三年到一二五八年蒙哥汗又派遣旭烈兀征服報達、波斯，建立伊耳汗國。(蒙古第三次西征。)同時又命忽必烈遠征大理，從此建立雲南行省。一二七五年到一二七六年忽必烈又滅南宋，統一中國。後又征服安南、緬甸。東南亞除了現在印度、印尼以外，大部分均爲蒙古人所統治。這一世紀中蒙古對外戰爭，除征伐日本因受颱風阻止外，可以說是橫行歐亞，一切馬到成功，戰無不克；聲勢煊赫，舉世震驚。祇有一二五八年到一二五九年蒙哥汗大舉伐宋，在南宋四川合州釣魚城下，苦戰不勝，大敗而歸；蒙哥汗即戰死於合州釣魚城下。這一戰役，成了歷史上一個難猜的謎，弄的歐洲學

(註一) 這篇論文曾於四十六年十二月二日，在臺北市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辦的四十六年度第四次「學術講論會」宣讀。茲加以補充，發表於此。關於蒙古、南宋爭奪川東合州釣魚山山城的全部材料，著者擬在「余玠評傳」與「宋季合州釣魚城忠蹟考」兩論文中，詳加論述。至於余玠設防山城，對當年蒙古入侵南宋的打擊與影響，著者曾有短文，名宋余玠設防山城對蒙古入侵的打擊，略言一二。見民國四十四年五月大陸雜誌第十卷第九期(頁二六七到二七一)。

者大都不得其解。既不願輕易相信十三世紀無敵於天下的蒙古大汗，像蒙哥汗這樣的戰略家，會敗死於孱弱的南宋；又不能不承認蒙哥汗戰死不歸，確是事實。因此洪元史譯文證補(卷二)，多桑蒙古史(馮承鈞中譯本上冊，一九二五年出版)，以及近人法國東洋史家葛魯賽教授(Prof. R. Grousset, 一八八五——一九五二)著的遠東史(*Histoire de l' Extrême-Orient*, 一九二九年出版。原書共五篇，馮承鈞譯五篇中的蒙古篇，別爲蒙古史略)，草原的帝國(*L' Empire des Steppes*, 一九三九年出版)，對於蒙哥汗一二五九年在四川的戰死，均含糊其詞，不能暢所欲言。德國漢學家，東洋史家傅朗克教授(Prof. Dr. Otto Franke, 一八六三——一九四六)在他所著五大本的中華通史(*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Reiches*, 1930-1952)的第四冊中，知道蒙哥汗是戰死在合州了，但也語焉不詳；而對於蒙古大汗所以戰死的原因，在於余玠的山城設防，仍然是一無所知。(此點當於文後附記中，略言之。)這自然是遠東史中急待彌補的一件重要史事。

至於說到蒙哥汗在釣魚城戰死的影響，那關係就更大了。約略的說，即有以下三點。(1) 延長了南宋的國祚二十餘年(一二五九——一二七九)。(2) 蒙哥汗本人接近蒙古的守舊派，對新得漢地的事情，不甚注意，一向信任皇弟忽必烈聽憑他去處置。忽必烈則是比較進步的親漢派；頗能用心選拔漢人，幫助他解決「漢地不治」的問題。此事醞釀已久，一二五九年蒙哥汗的暴死，卻急轉直下，改變了蒙古人統治東亞漢地的態度。(實際上也就是對中原漢文化的態度。)(3) 忽必烈得以早日即位大汗，很開明的採用了契丹人管理長城以內漢地的成法，正式推行兩元政治；「以漢法治理漢地，用蒙古法治理蒙古」。使中國自三代秦漢到南宋的傳統文化，在蒙古族整個統一了全部中國以後(一二七六到一三六八)，不但未受大量破壞，反而得到意外的尊重。因此蒙哥汗一二五八到一二五九年伐宋與南宋爭奪巴蜀在釣魚城的戰死，不但是對於中國的儒教大同文化，東亞列朝一系的中國歷史是一件奇蹟；即是對於世界史說，也是一件值得注意的大事。

實際上，漢文中現存關於一二五八到一二五九年，蒙古與南宋爭奪巴蜀戰役的史料(直接的史料)與參考資料，是相當豐富的。鄙人曾着手加以搜集，迄至目前，數量已多。這些史料大致可以歸爲下列三類：(一) 余玠經營巴蜀，(一二四一到一二五

三)。從他受命治蜀，設立招賢館，任用冉璣、冉璞兄弟，張實、王惟忠、朱文炳等，到建立以八柱為據點的十餘山城，阻止住蒙古的騎兵，保障了巴蜀，蜀人始有安土之心。這是第一組。(二)一二五八年蒙哥汗大舉入蜀伐宋，宋王堅的苦守釣魚城，到一二五九年七月蒙哥汗的戰死。是為第二組。(三)一二七六年宋都城杭州不守，又二年崖山覆軍，南宋滅亡；重慶陷落，張珏殉國；王立與合州數十萬軍民，國亡力竭，猶得保全。這一期為第三組。這三組的史料，採自舊元史，宋史、宋季三朝政要，蘇天爵的元文類，元朝名臣事略，元人文集，(如耶律鑄的雙溪醉隱集，姚燧的牧庵集，蘇天爵的滋溪文稿，虞集的道園學古錄等等)，嘉慶一統志(有關四川省山城與天池等部份)，讀史方輿紀要，地方州縣志，(如張森楷的新修合川縣志)等等。各組史料均相當豐富；就中採自元史，牧庵集(姚燧曾參與此一戰役中招撫王立事)，新修合川縣志者尤多。(詳「蒙古與南宋爭奪巴蜀始末史料選輯」。)(註一)因為新修合川縣志，除鈔自正史者不計外，所述地方掌故，山川形勢，見聞較切，是應當可以相信的。但因地方志的作者，學識博隘不一，行文巧拙不同；又因囿於見聞，不能博考，所述事跡，每與當時各家文集中的有關記載，互相牴牾。不經詳加比較，不易窺見事實的真象。又因南宋國亡，宋賢著述散失，理宗以後的事跡，語焉不詳，至為遺憾。本論文擬先取合川縣志釣魚城記中有關「熊耳夫人的家世」與「王立、合州數十萬軍民得以保全」的真象，依據元史有關列傳，元人文集等，作一比較研究，以資示例。

二、合川志釣魚城記與王立補傳所述熊耳夫人家世考

張森楷新修合川縣志存有兩文，說到當年拯救王立與合州數十萬軍民的熊耳夫人。一文是釣魚城記，相當古老，不云誰作。清乾隆時黃廷桂所修四川通志即收有此文，也沒有注明作者姓名。另一文即是合川張森楷民國二十年在新修合川縣志中增修的王立補傳。兩文就內容說，有因襲的關係；即是王立補傳，大部分鈔自釣魚城記，而文字較佳。現在將說到熊耳夫人的幾點，照錄如下。

(註一)關於「蒙古與南宋爭奪巴蜀始末」的史料與後人的研究，已由著者從事輯錄。依上述三大類，加以排列；計已得五十餘篇，二十餘萬字。獨惜引見於徐乾學通鑑後編及四庫總目提要(卷四十七)的「余玠家傳」，尚未覓得，頗為悵然！容他日以專刊發表，敬請同好師友的教正。

『宋恭帝德祐元年（一二七五）以合州安撫使張珏有功，遷四川制置副使，知重慶府；以王立爲安撫使，兼知合州代之。立既任事，益嚴守備，兵民相爲腹心。聲息稍緩，卽討捕鄰邑之降北者。……（端宗）景炎二年（一二七七）北兵來攻，城圍甚急，王命不通，已三年餘。兼以重慶叛將獻城，張珏被俘；合州益孤危無援。

北兵來攻城者日益衆，且呼告之，曰：「宋已歸我國久矣！爾旣無主，爲誰守乎？」城中之民兇懼，知其禍在頃刻；然皆協力無異謀。立因出誓衆。曰：「某等荷國厚恩，當以死報。其如數十萬生靈何！」言已而泣，衆大痛，咸泣不可仰。顧念憲宗之殂，（事在一二五九年）罪在不赦，又久與東川行院（汪田哥父子等）戰，多殺其兵將有深怨；終無計以解之！

立歸家，愁蹙不食。其家有義妹熊耳夫人者，故北營渠帥妻也，以俘虜來。初至，立召問之。則曰：「妾姓王氏。」立喜曰：「作爲吾妹，侍我之母；待獲爾夫，再俾完聚。」夫人深謝之。立待如同乳之妹，已數年矣。至是見立大憂，亦虞城破禍及；乃正告立曰：「妹實姓李，今成都總帥李德輝，妹之親兄也。若知安撫待我恩禮，必盡心上奏，親來救此一城人民。公謂何如？」

立聞大喜。卽令致書德輝，遣儒生楊禦等潛赴成都納款。夫人仍附鞋一綯（音兩。原注：履一雙曰綯。）爲信，蓋夫人舊爲德輝作鞋有式，德輝甚愛之也。

德輝得書，知妹在釣魚城，喜不自勝，卽遣使赴闕，星馳奏聞。而先遣禦等歸，語立夤夜豎降旗於城上，當卽親領兵至城下受降。』（以上合川縣志名宦八，王立補傳與卷一注引釣魚城記。）

上述合川志所載熊耳夫人的家世，旣非出自直接史料，又無遺留古物如圖譜遺像等，可資憑依；平情分析，證據不足，疑竇甚多，不可盡信。疑竇最顯著者略舉如下。十三世紀中葉以後，南宋與蒙古爭奪巴蜀，乃中原漢族與邊疆蒙古民族間的國際戰爭。所說「北營渠帥之妻」，自是蒙古軍中上級軍官的妻子。王立爲南宋的愛國軍人，那能旣俘北營渠帥的妻子，僅因她自稱姓王，卽輕心加以收容；且使居家侍母，稱爲義妹呢？此其一。至於說「待獲爾夫，再俾完聚」，距今七百年以前，戰亂時期，軍人中竟有如此義士，實在使人難以置信。此其二。李德輝是元朝初年（自西元一二六〇——

二八〇) 蒙古漢臣中的名人。不但元史(一六三)有很詳的傳記，而且姚燧牧庵集(卷三十)中有長逾五千字的左丞李忠宣公行狀，蘇天爵所編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一)有他的事略，(大部份採自行狀，)與元文類(卷四十九)也收有姚燧所撰的行狀。我們應該詳加考察，看元人記載中，對於此事，有無可靠的新材料，用資補助。此其三。就合川志釣魚城記或王立補傳所說，熊耳夫人當一二七八年，杭州已降，宋主(恭帝)北遷，張珏被俘；王立與合州數十萬軍民山窮水盡，朝不保夕的時候；忽然以一女子用義妹的身份出現，救了合州城數十萬軍民。這未免戲劇性太強烈了。我們應當考察李德輝的救合州，是專爲外妹的一封書信呢？或是招撫合州是他一貫的主張呢？若僅僅依照上述釣魚城記的說法，反而令人不能相信。此其四。釣魚城記又說熊耳夫人舊爲李德輝作鞋有式。使者傳書至成都，並携鞋一雙，示德輝以爲信。德輝喜不自勝，即挺身到合州受降。意若設不如此，李德輝將不救合州者。這也是傳奇的意味太重了。我們雖不能斷定沒有這一回事，但也尚有斟酌的餘地。至少應該意識到，牠將不是合州得救的主因，而至多只是一個助因。此其五。鄙人留心遼宋金元四朝史，喜讀宋元人文集，且對於蒙古南宋經營巴蜀問題，注意搜集材料，詳加分析；擬撰作論文，就正同好。謹先提出此一問題，依據涉獵所及，就上述四點約爲下列兩項，加以考察，論評如後。

(1) 關於合川志釣魚城記所說熊耳夫人家世者 此事可歸爲以下三點。(一)她是「故北營渠帥的妻子。」以俘虜的身份來到合州。(二)初被召問，自稱姓王，因被主帥王立認爲義妹，得以留住王家，侍奉王太夫人。(三)數年後，合州危急，且夕不保。她看到王立等的憂愁，也恐城破禍及，乃又自承：「妹實姓李；今成都總帥李德輝，妹之親兄。」「若知安撫待我恩禮，必來救此一城人民。」我們依據這些線索，去尋查有關史料，如元史李德輝傳，元朝名臣事略中的李德輝事略，姚燧牧庵集與元文類中的李忠宣公行狀等，知道李德輝是現在河北省的通縣人。父名朴，三十九歲卒，時德輝方五歲。母親宗氏，持家嚴整，共生三子；長德英，次德芬，三爲德輝。(以上均見牧庵集行狀。)沒有提到他尚有一位妹妹。但就我國的舊習慣說，國史列傳中不提某人尚有妹妹，也是常有的事；自不能因此即說他沒有妹妹。次查王立，張珏最近數年來對蒙古方面的戰爭。則有度宗咸淳六年(一二七〇)與汪惟正的戰爭；七年，八

宋蒙釣魚城戰役中熊耳夫人家世及王立與合州獲得保全考

年，（一二七一—一二七二）與蒙古將合刺等的戰爭；德祐三年（一二七六）復瀘州的戰爭；但均未提及有熊耳將軍或熊耳夫人。後由賀貢獻金事，研究元初賀氏父子（賀貴、賀仁傑、賀勝等）的行事，因在姚燧牧庵集（卷十七）上都留守賀仁傑神道碑中，找到了所謂熊耳夫人的真實身世。原文如下：

『至元十有一年（一二七四）梅應春舉瀘州降（元），制即以其爲安撫使。明年（一二七五）大兵圍重慶；又明年（一二七六）宋制使張珏遣王立潛師襲瀘，取之。醢應春，殺戍將千戶熊耳，而有其妻宗，甚嬖之。宗，王相西川行院李忠宣（德輝）之「外妹」。立後移守合州；行東川院事者，則憲宗帶玉器械合丹、闊里吉思二人。先朝（憲宗即蒙哥汗）陟方乎此，拔將甘心；故合益負險不下。

『宗說立遣張邵輩偕蠻書，間行至成都，請忠宣受降。忠宣從五百人至，立則開壁納之。忠宣以王相罷置其吏，而去。』（餘詳下節。）

這樣，熊耳夫人的家世，我們就完全明白了。（一）她是北軍保衛瀘州的戍將熊耳千戶的夫人。（熊耳應當不是漢姓，也不類蒙古姓，）（二）她既不姓王，又不姓李，實在姓宗；而是李德輝的外表。外妹，即是姑表兄妹。這一點就牧庵集的李德輝行狀所述，（可惜元史卷一六三李德輝傳刪去此節，對此全無透露！）可以完全確定。列舉如下。（一）姚燧李忠宣公行狀明言：「考朴，尚書吏部主事，妣宗夫人。」（二）又說：「吏部君生三十九年，且卒，指公謂宗夫人曰：「是兒其大吾門者，勿憂貧且賤！」（三）「公（德輝）以先（太）夫人剛嚴，其弟「宗亨」有小過，對衆奮杖撻之，不少惜。公若何而歡奉，使未嘗有厲色遽言，其亦能子哉！」（四）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一），左丞李忠宣公事略，也說：「吏部君且卒，指公謂宗夫人曰：「吾爲吏，治獄不任悍鷙刻削，人蒙吾力脫罪罟，齒平民者衆，天或報施善人，是兒其大我門者！」依據上列諸證，則熊耳夫人姓宗，是李德輝的表妹，可無容疑。

（2）李德輝拯救合州與王立原因的分析 上述熊耳夫人的身世與遭遇，是兩國交兵時期中，一件富有戲劇性的巧合事體。但是不是就是李德輝決心拯救合州和合州與王立等因以得救的唯一原因呢？則細查元史（一六三）李德輝傳，姚燧李忠宣公行狀（元文類四十九同）與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一）等，則知並不如釣魚城記所說的那樣簡單。這一點，不僅牽涉到李德輝與東川帥臣汪惟正，合丹等的地位不

同，也反映李德輝、忽必烈對漢地所持不同的政見。從上述史料中，我們知道，李德輝是一向主張與合州，重慶妥協的。他反對用兵，而主張使用招降的方式與合州妥協。這一點正是忽必烈的新國策，而為憲宗派的蒙古人所不甚贊同的。茲選錄以下幾節，以著梗概。（下文以元史李德輝傳為主，兼採元朝名臣事略李忠宣事略，牧庵集行狀等。）

（一）『至元十二年（一二七五）詔（德輝）以王相撫蜀。時重慶猶城守不下，朝廷各置行樞密院於東西川，合兵（數）萬人（事略，行狀均有數字）圍之。德輝至成都，兩府爭遣使咨受兵食方略。德輝戒之曰：「宋已亡矣，重慶以彈丸之地，不降何歸？正以公輩利其剽殺，民不得有子女，懼而不來耳！……水陸之師，雷鼓繼進，實堅其不下也。況復軍政不一，相讐紛紛，朝夕敗矣，豈能成功哉？」（以上元史一六三本傳，參用牧庵集卷三十行狀。）

結果，恰如李德輝所料，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張珏使王立復瀘州，殺了熊耳千戶，而有其妻宗氏。北軍圍重慶者潰敗，珏因入重慶就置制副使職，而王立代知合州。這一件事，證明了李德輝在王立未俘獲熊耳夫人以前，他即是主張與重慶、合州妥協的。

（二）『初公撫蜀經東川歸，以爲重慶帥閫受圍，必徵諸屬州兵，盡銳拒守，合州宜虛。誠使人持書曉之，兵隨其後，亦制合一奇也。即出合州俘繫順慶（山城之一，名青居城，余玠徙順慶治所於此，今南充縣南三十五里。）獄者，縱之使歸。語州將張珏以「天子威德遠著，宋室淪亡，三宮皆北。（可汗）聖量含弘，錄功忘過。能早自歸，必取將相，與夏（貴）呂（文德）比。」又爲書反覆譬解，以爲：「汝之爲臣，不親於宋之子孫；合之爲州，不大於宋之天下。彼子孫已舉天下而歸我，其臣顧偃然負阻窮山；而曰：「吾忠於所事」，不亦惑乎？且此州之人，昔不自爲謀者，以國有主，寧死不欲身被不義之名；故爾得制其死命。主今亡矣，猶欲以是行之；則戲下以盜賊遇君，竊君首以徼福一旦，不難也。」其說累數千百言，……珏未及報，而公還王邸。』（以上行狀，參用元史本傳。）

據此可知李德輝主張與重慶、合州妥協，不僅早有準備，而且也有他自己的一貫的主

張。他這一篇勸降書，應當是在至元十四年（一二七七）發表的。時張珏使王立復取瀘洲，元兵潰敗；他自己因得赴重慶就任置制副使，王立代爲合州安撫使；所以張珏、王立對之沒有反應。同年合州王立遣李興、張邵十二人調（偵）事成都，皆獲之，當斬。德輝從呂壘言，復縱歸，（見元史一六七呂壘傳），爲書喻王立，其言如喻珏者而益剝切。未幾瀘州復歸北軍。十五年（一二七八）重慶再度被圍，張珏與元將也速解兒決戰；北兵合擊，珏兵大潰，被俘殉國。合州震驚，王立誓衆痛哭。熊耳夫人乃自言「實不姓王，而姓宗，與成都李相是姑表親。」立大慰，即再使李興等導幹帥楊禦，懷熊耳夫人所作蠟書，間至成都，向德輝投誠。德輝既知立誠心歸服，且有外妹來書，即從數百人親來合州受降。由是可知，李德輝不主用兵，而願與合州，王立妥協，乃是他一貫的主張。熊耳夫人的致書，實僅是一個助因與巧合罷了。總上二事合觀之，則熊耳夫人的家世與她何以被俘，她與王立的真正關係，以及她對合州數十萬軍民獲得保全的影響與李德輝受降的順利，均可瞭然。那末釣魚城記所說的，她姓王，曾爲王立義妹，曾爲李德輝作鞋有式等等，則知全屬圓謠，臆造；是故事而不是信史了。

三、王立與合州得救的真因

至於合州守將王立的最後得救，則純是出於元初儒者許衡、呂端、姚燧諸人的苦心維護。事情的經過，詳見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十一），姚燧牧庵集（十七）賀仁傑神道碑，元史（一六九）賀仁傑傳，元史（一六七）呂壘傳。茲舉各文有關要點如左，以著梗概。

（1）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十一）李忠宣公事略：『公從兵數百人至合，東府害其來爭功。曰：「前歲公招珏，誠極寬矣；竟不見悟，無功而還。今立、珏牙校也，習狙詐不信。特以計致公來，使與吾爭垂成之功，延命晷刻耳；未必定降。」公曰：「前歲合以重慶存，故力可以同惡。今也孤絕，窮而來歸，亦其勢然。我非攘君功者，誠恐汝憤其後服，誣以嘗抗蹕先朝，利其剽奪，快心於屠城也。吾爲國活此民，豈與汝計嫌怨爲哉！」卽單舸濟江薄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合人自立而下，家繪像事之。』…（姚燧牧庵集（三十）李忠宣公行狀同。）關於李德輝受降以後，川東行院與王立的爭持，仍在繼續；且一度勢甚驚險，王立幾

乎被殺。經過情形，略述如後。

(2) 姚燧賀仁傑神道碑：「東院恥無功，械立於長安獄，奏殺之。時安西王(忙哥刺、忽必烈第三子，)受詔征漢，比未知合既下也。自軍中下教長安、遣姚燧乘傳招之。下，則許貸立死，以爲安撫使。而誅立敕使先至。其日，將醢之；而教亦至。東院以敕教違行，死生異也；破械出立，而幽之別室。相府，東院各遣使再請，樞密以帝有成命，不以教聞。」

東西兩行院互相爭持，各欲快一時的意氣，事情演變至此，可說是危險極了。設非西院(安西王)派遣呂端善親至大都(今北平)，面告他們的老師許衡，(姚燧與呂壘(一字端善)，賀仁傑，甚至安西王，都是許衡的學生。) 許衡面告賀仁傑。賀仁傑因是上都留守，且爲忽必烈汗的親隨侍衛，可以隨時入帳報告，事將無從挽救了。此事須排列牧庵集賀仁傑神道碑，元史(一六九)賀仁傑傳，元史(一六七)呂壘傳等，參合比較，方更明白。茲以賀仁傑神道碑爲主，參以他傳，引述如左。(引用他傳，字有異文者，另加括弧，以示區別。)

(3) 『會西院遣都事呂端善他事至京師，(言於許衡，許衡白留守賀仁傑，) 仁傑入聞。帝詰宥(樞)密臣曰：「卿輩以殺人爲嬉(戲)耶？(今召王立)，使立生至，則已。死，則汝等從之！」因驛致立，賜金虎符，仍以爲合州安撫使。先師許左相多公力能回天。既而立來見，謝公曰：「教活臣於始，賀公活臣於終；惟死以報！」』

據元朝名臣事略(八)許衡於至元十五(一二七八)，十六(一二七九)年，正住在大都修授時曆。十五年三月授集賢大學士兼領太史院事。他與他的學生苦心孤詣拯救王立，自是欽敬王立與釣魚城軍民忠烈的行動；鞠躬盡瘁，力竭而後已。這些忠於所事的義行美德，自然是主張行道的儒者像許衡一般人，所樂意幫助的。

二十年爲國家，爲民族，(自一二五九——二七八)苦守釣魚城的英雄張珏、王立；一個爲國家力戰，被俘自殺；一個苦守力竭，國亡受撫；又經歷種種磨折，終能保全。這些忠蹟，都很值得追念。「慷慨死節易，從容就義難」，張珏、王立、文天祥，均能忠於所事，無忝職守。就中張珏、文天祥力竭國亡，而後與之俱盡，尤爲難能可貴。王立是戰士，而非主帥，戰至最後，忍痛爲合州數十萬軍民就撫，自也是很

難得的。

附記：歐洲學者對於蒙哥汗戰死釣魚城與 宋余玠山城設防的認識

西元一二五九年蒙古蒙哥大汗(元憲宗)入蜀伐宋，戰死於合州釣魚山上的釣魚城下；與一二四一年以後宋臣余玠利用巴蜀地形，建築山城，移治設防，因能阻止了蒙古騎兵的入侵。這兩件事是有因果關係的。而且對於蒙古與南宋在中國角逐爭霸的全局，也有着決定性的作用。西方學者與西域史家（如東亞史家、蒙古史家等）對於蒙哥汗戰死一事，多語焉不詳。而對於余玠山城設防，阻止蒙古騎兵南侵一事，則知者尤少。茲就淺學所已知者，略加考查，記述如下。

(一)多桑 (C. d' Ohsson)：蒙古史 (*Histoire des Mongols*) 這是一部直接採用波斯、阿拉伯文原史料寫成(法文)的蒙古專史。原書四冊，一八二四年在巴黎出版。漢文有馮承鈞氏民國二十五年的譯本。譯筆簡明爽朗；前一卷中有校勘補註與考異互證，甚見博識。蒙哥汗入蜀伐宋，戰死釣魚山，見蒙古史第二卷第七章，漢譯本頁二八四到二八八。而余玠治蜀，築新城於釣魚山的偉蹟，則未被提及。因為多桑敍述蒙古伐宋事，曾利用當時已譯成西文的三部中國史書，即是元史四大汗（太祖、太宗、定宗、憲宗）本紀，續通鑑綱目與續弘簡錄（即元史類編）。這三部書，就現代的觀點說，都是轉手的史料；考證既欠精審，引用材料又沒有註明出處，所以每到主要關鍵，即記事模糊，不能憑信。即以漢譯本上冊，第二卷第七章，頁二七八，記述蒙哥汗戰死釣魚城一事說，即欠明瞭。原書說：「六月蒙哥屢攻合州不克。七月……蒙古軍數攻城，死傷甚衆。而軍中痢疾盛行，蒙哥亦得疾。八月……蒙哥死於合州城東十里之釣魚山。」又說：「此汗在位八年，壽五十有二。」釣魚山下面原註說：「宋君榮書(一二一頁)謂或傳其中流矢，是語不知何所本。元史謂其死於釣魚山。綱目則謂其死於合州城下。刺失德（拉施特）則謂蒙哥嗜酒。時軍中赤痢盛行，因染疾死。」（手頭無多桑原書。然檢對日人田中萃一郎多桑書日譯岩波文庫本（下卷20頁）註文與馮先生譯文相同，可知這些都是多桑氏的原註。）由上文，可知多桑氏對於蒙哥汗當年戰

死的情形，是相當模糊的。第一、「或傳其中流矢死」，他說：「是語不知所本。」這一點馮承鈞先生已代他補充了。即跟着說：「鈞案，語見續通鑑綱目卷二十一。」第二、他不知道當時的合州城下，即是在釣魚山上。因為南宋自一二四一年，余玠設計，建築了許多山城，就把當時的重要府治、州治，都移到新建的山城了。釣魚城即在原設合州舊治東北十里許的釣魚山上。因此說，「蒙哥汗死於釣魚山」，也即是說，他死於合州城下。兩地原是一處。照這樣的山城，最有名的，即有八處。姚燧牧庵集中稱為「保蜀八柱。」第三、多桑書中未提及余玠如何經營巴蜀，自然也是美中的不足。

(二)洪鈞：元史譯文證補 洪文卿的名著元史譯文證補三十卷，現存二十卷，原書成於光緒朝壬辰（一八九二）癸巳（一八九三）間，印於一八九七年（陸潤庠序）。原書敍事謹嚴，議論明快，雖然出版已將六十年了；我還是贊成民國二十三年馮承鈞在多桑蒙古史譯本前的說法：「我（馮氏）以為貝勒津本的拉施特書未漢譯以前，（按應當說：波斯文拉施特原書，未譯成中文以前，）元史譯文證補一書，（仍）是可以參考的。」證補卷二，是「定宗、憲宗本紀補異」。關於憲宗者，證補詳述他被選充可汗的經過及如何處置當時的反對黨，未言憲宗伐宋及在釣魚山戰死事。但據上引馮譯多桑蒙古史（卷二，第七章，漢譯本二八七頁。）知「拉施特謂蒙哥嗜酒，時軍中赤痢盛行，因染疾死。」則是拉施特對蒙哥汗的死，另有不同於漢文記載的說法，可惜洪文卿當時未及注意吧了。

(三)格魯賽 (R. Grousset, 一八八五——一九五二)、蒙古史略等 格魯賽是近代法國有名的東亞史家和中國史家。他的著作有遠東史（一九二九），草原的帝國 (L' Empire des Steppes, 一九三九。日人後藤十三雄譯為亞細亞遊牧民族史，昭和十八年，即一九四三年出版），中國通史（有英文本，一九四二）等。馮承鈞氏曾譯遠東史五篇中的蒙古篇為蒙古史略。（一〇一頁，民國三十三年出版。）就馮氏的譯本說，格魯賽引用伯希和，沙畹諸先生多年研究漢學的心得，寫成蒙古史略，簡要精密，能見其大，甚為難得。（馮氏認為遠東史中的中國兩篇，因作者不能自由直接引用中文材料，所以內容頗為簡陋，……也屬確評。）該書第二卷中有「蒙哥汗時代」（頁四十七到五十一）一章（即第五章），重在敍述

蒙哥汗的被選立，與當時對於西方（歐洲、前亞）的交通關係。僅於下一章（第六章）忽必烈侵宋時說：「蒙哥汗圖謀取宋，然不從長江正面進兵，而從雲南（四川）入手。迨忽必烈兵渡大江，適蒙哥汗之凶問至（一二五九），忽必烈卽與南宋議和，引軍北還。」（以上頁五十三、五十四大意。）在草原的帝國第二編成吉思汗與蒙古族，第二章成吉思汗的三個繼承者，曾說到蒙哥汗與伐宋戰爭。這裏雖說到勇將孟珙（死於一二四六），曾如何固守襄陽，爭奪四川如何重要，但未提到余玠駐節重慶，建立山城的功績。雖也說到蒙哥汗圍攻合州（今合川），因得痢疾，死於合州近傍，而沒有說到釣魚城即是宋人在釣魚山所築的山城。這些自然也都是美中的遺憾。

（四）傅朗克（Prof. O. Franke, 一八六三——一九四六）在所著中華通史中，對蒙哥汗戰死合州的認識。

傅朗克教授的中華通史，自上古到元末，共五大冊。（第一冊，自上古到漢末，計四三一頁，1930年出版；第二冊，自魏晉到唐末，六〇七頁，1936年出版；第三冊爲第一冊，第二冊的註解與補充，連「引得」共576頁，1937年出版。第四冊，自五代遼朝到元亡，595頁，1948出版。第五冊爲第四冊的註解與補充，連「引得」共354頁，1952出版。）他在第四冊第三章（323—324頁）與第五冊（註釋本）第170頁以下，曾談到蒙古的圍攻釣魚山與蒙哥汗（憲宗）的戰死。在第五冊註釋補充中，也曾討論到歐洲人所知關於蒙哥汗死訊的傳說。並指明最早的傳說，是見於馬哥波羅（Marco Polo）的東方見聞記。茲先述第四冊正文（S. 323—324），並節引第五冊註釋，如下。

『三月開始圍攻，至七月不克。時已暑熱，又值雨季，使戰事進行，陷於停頓。蒙哥汗不豫，退至附近山中。不幸因疾而死，相傳所染爲痢疾（Dysenterie），一說由於箭傷；享壽五十又一。（依歐洲習慣計算。）時爲一二五九年八月十一日。蒙哥汗的死，恰與十八年前（一二四一）窩闊台大汗的死相類；蒙古帝國的現狀爲之一變；南宋因此獲救，也與當年歐洲的獲救相似。』……（以上中華通史第四冊，頁323—324）。

第五冊註釋本頁一七〇到一七一，對於蒙哥汗的死有以下的補充，也譯述如下。

「據元史類編卷一（譯者按：卷一爲世紀：一、太祖，二、太宗，三、定宗，四、憲宗）頁二十（背面）說：「癸亥，帝崩於釣魚山，……或云爲飛矢所中。」（諸大臣奉櫬北還。）又馬可波羅東方見聞記（Yule-Cordier 英譯詳註本），第一冊頁 244 到 245 也說：「大汗因箭傷膝骨（Knie）而死。」並說：「受傷地是一座要塞，名叫“Caaju”，後經 Yule 先生考定，正確的名稱，應當即是合州（Ho-Tschou）。」……又說：「續通鑑卷一七五（頁六）引重慶志，認爲蒙哥汗的箭傷，蓋由汪德臣受擊飛石而致誤。因中國有關史料，並未說到受傷的事情。」又說：元史（一五五）史天澤傳則說：「戊午（一二五八）秋憲宗伐宋，由西蜀以入。己未（一二五九）夏駐合州之釣魚山，軍中大疫，咸議班師。宋將呂文德以艨艟千餘泝嘉陵江而上，北軍迎戰不利。帝（蒙哥）命天澤禦之。……」（以上直接採自元史史天澤傳。）因此傅朗克即說：『由是我們可以得一結論：「蒙哥汗攻合州時受傷，後在釣魚山傷重，或因染疫（或爲痢疾 Ruhr）而死。」』（以上中華通史第五冊，頁一七〇到一七一）。

總結以上所引，傅朗克教授的考證，遠較前人爲詳。但也有以下的弱點。第一、他似乎也不知道釣魚山與釣魚城實在是一個地方。第二、他也一樣的沒有提到創立山城設防，因以阻止住蒙古騎兵的余玠。

又，查馬可波羅東方見聞記（Yule-Cordier 本、第一冊、頁244；245，一九二六年重印本，）所記此事，則頗爲荒唐。原文說：「成吉思汗克服了許多名城，要塞，最後攻奪 Caaju（合州），膝蓋骨中箭而死。」Yule 先生在注文中指出：「成吉思汗是善終的。這應當是蒙哥汗（Mongu Khan）死於合州之誤。」……（以上英文 Yule-Cordier 譯註本，“Travels of Marco Polo” 第一冊，頁245。）

總之，歐洲學者對於蒙古史的研究，宋、蒙關係的這一環，所知尚不甚多。即伯希和先生所主持的「通報」，對於余玠保蜀，山城設防，蒙哥汗戰死釣魚城諸事，也沒有具體的指明。因此著者特將有關這一環的史料，依次蒐輯，編爲專篇，題曰「蒙古與南宋爭奪巴蜀始末」，以資補充。這一專輯將與「余玠評傳」與「宋季合州釣魚城忠蹟考」同時發表。